

· 会议综述 ·

新时代背景下创新与产业发展

——第二届创新与产业经济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8年6月8日,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奥熊彼特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创新与产业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成功召开。为了提高该研讨会学术交流水平,这次研讨会主办方特别邀请到产业组织理论与应用计量、创新研究等领域的国际知名教授到会交流论文,其中特别邀请到 Research Policy、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等杂志主编和编委会交流他们的最新文章,并且向国内外学者征集最新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家学者们围绕“创新、产业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一、构建创新驱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新时代推进赶超发达国家意义的现代化的动力是创新,在十九大报告中,“创新”一词出现 50 余次,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调创新是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首先发表了以“创新是新时代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为主题的主旨报告,提出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开启现代化征程的关键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个领域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着重论证了创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强调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着力于产业创新,尤其是“新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使产业创新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科技和产业创新最有效的对接方式,通过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国立首尔大学经济系 Keun Lee 教授以“从全球价值链到本土价值链:知识创造”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汇报,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更多地参与 GVC,而是在学习和借鉴 GVC 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国内增值,这是同构建本土国家创新体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本地知识创造能力和国内附加值的关系方面,建设本地创新体系对于创造和升级国内附加值尤为重要,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途径。伦敦大学玛丽分校 Sushanta Mallic 教授以“R&D、知识溢出与企业绩效”为题对创新与微观绩效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后发现,后危机时期无形资产的真实估值改变了企业绩效,经济增长中出现“生产率悖论”,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科技稳步发展,但生产率增长停滞或下降;持续增长需要密集的 R&D 活动或知识在国内或国际上的渗透,行业自主研发活动以及知识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尤为重要,知识资产与知识存量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评估,因此应该把知识溢出作为提高产业绩效的一种渠道。

二、以企业为创新主体驱动经济发展

(一)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形式

新时代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更需要产业创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有多种形式,随着互联网等通用技术的应用,电子商务成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市场的交易模式,关系到市场结构、配置效率甚至整个社会的福利。上海交通大学李斌从创新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结果发现电子商务会在中小企业中引发更多

的创新活动或创新产品。东南大学高彦彦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利用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中国最发达地区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的三波创新调查,通过自然实验分析了高铁对创新的影响,发现周边地区的高铁连接促进了制造业的创新,高铁连接还引起企业家对创新和产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企业进入外部市场,开展创新合作。路易斯威尔大学的 Yong Chao et al 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特征及其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认为知识影响技术和产品创新的路径中都需要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存量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二)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的管理者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布鲁塞尔大学的 Patrick Legros 教授提出企业家精神对于创新的提升作用,并从企业学习或者外部学习的抉择角度探讨了劳动力市场摩擦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提出当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时,只有雇员产生有价值的商业想法或者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成为企业家。代顿大学的 Zhang Ting 研究发现董事会的多元化与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正相关的,拥有多元化董事会的企业会创造更多的突破性创新,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提升效应越明显。武汉大学的崔静波博士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前十大股东的专利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所有者通过技术溢出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江苏大学的史俊国利用 CDM 模式在中国制造业中的应用,分析了所有权与竞争影响创新同生产力的关系,提出创新—生产率链并将其分为创新意识、创新努力、创新产出和生产率提升四个阶段;国有企业专注于创新意识阶段,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外资企业在生产率提升阶段比较活跃,而私营企业集中在创新意识和创新努力两个阶段。中南大学的史军伟利用中国制造业的数据考察了工资和创新绩效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资增长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加薪确实有助于创新绩效。

(三)为企业创新提供有效制度供给

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华东理工大学的牟琦基于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所有制制度、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机构投资者和政府补贴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和制度保障,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实体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所有权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南京审计大学赵宁如通过建立代理人模型分析道德风险问题,分析了政府的干预如何影响创新和创业,政府的间接干预和直接干预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政府的间接干预总是增加代理人的努力,促进社会剩余;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不总是会增加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如果政府在企业中的份额占主导地位,政府的直接干预对项目的边际贡献足够高时,会产生比间接融资更高的社会盈余。

三、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求创新发展

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形成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着力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参会学者南京大学的孟宁利用中国出口商的数据分析了反倾销对于中国出口商出口产品质量和价格的影响,作为对反倾销的回应,出口商倾向于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降低目标市场的目标产品的价格;反倾销促使企业更积极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价格,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公司来说,反倾销的影响是最小的;在面临反倾销时,企业资源被重新分配到不同的产品上,并倾向于生产更高的质量、更低的价格或更接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东华大学的王磊提出沟通机制会影响本土供应商对海外知识的获取,通过考察两种不同的企业间沟通机制对本土供应商海外知识获取的影响,发现具体影响取决于如何管理与合作海外买家的关系,基于技术的沟通机制(TCM)和个人沟通机制(PCM)都有利于海外知识获取;当焦点供应商扮演不同的角色(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原始设计制造商)时,对知识获取的影响会变得更加明显。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郑江淮 张玉昌 戴一鑫)

(责任编辑:杨新铭)

(校对:李仁贵)